

不同網路霸凌情境的旁觀者反應 傾向探究：網路霸凌辨識能力、 道德疏離與受害者行為的影響

陳冠銘¹

旁觀者的行為反應對於網路霸凌事件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在旁觀者選擇反應方式之前，會受到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以上三者如何影響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傾向及叱喝行為傾向。研究方式採調查研究法，受試者為 1,393 位臺灣大學生，研究工具包含《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網路道德疏離量表》，以及兩份不同情境的《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調節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受害者單純受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旁觀者的道德疏離並不會調節其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叱喝行為之間的負向關係，但在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中，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叱喝行為之間具有調節效果。根據以上結果，本研究提出在網路霸凌防治策略上的具體建議。

關鍵詞：網路霸凌、網路霸凌辨識、道德疏離、受害者行為、旁觀者行為

¹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陳冠銘，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a1942333@yahoo.com.tw。

2022 年全球網路的固定使用者正式突破 50 億人，社群媒體的固定使用者也攀升到 47 億人（Kemp, 2022）。人與網路的連結變得密不可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際互動是透過網路作為載體而發生。網路促進人們連結的同時，卻也引發各種人際之間的暴力與攻擊事件，如「霸凌」便藉由網路及電子設備等載體，形成超越傳統肢體、言語、關係三類型（Bauman & Del Rio, 2006; Jacobsen & Bauman, 2007; Wang et al., 2009）的新霸凌型態－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

網路霸凌的現象在全世界皆快速增長（Lee & Shin, 2017; Wang et al., 2019; Zhu et al., 2021）。Chen 與 Chen（2020）調查中國、香港、臺灣青少年網路霸凌的狀況，結果顯示曾在網路上霸凌他人的比例分別為 7.7%、20.4% 與 20.6%，曾在網路上被他人霸凌的比例則是 23.8%、33.9% 與 31.7%，顯示網路霸凌在當前的華人社會具有高盛行率。相較於傳統霸凌，網路霸凌具有匿名性和永久性兩項特點，匿名性會使霸凌的言語變得更加暴力，受害者更難以抵抗霸凌事件所帶來的影響（Aboujaoude et al., 2015; Slonje et al., 2013），永久性則會使帶有傷害性的貼文不斷被閱聽人轉發，帶給受害者持續性的傷害。這些特性使受害者僅能被动採用封鎖、換帳號、停止上網等策略，卻難以阻止網路霸凌的傳播，造成網路上的權力不對等（Raskauskas & Huynh, 2015; Slonje et al., 2013），並被證實會對受害者帶來不小於傳統霸凌的傷害（Beckman et al., 2012; Hamm et al., 2015; Kowalski & Limber, 2013）。

霸凌事件中，霸凌者通常透過霸凌行為展現自身的權力、獲取同儕關注或是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旁觀者對於霸凌的反應會對事件發展形成重要影響（Salmivalli, 2010; Salmivalli et al., 2011）。若旁觀者目睹霸凌事件後選擇在旁起鬨、吆喝、鼓勵，或對受害者落井下石，霸凌者的行為就有可能受到增強；反之，若旁觀者對霸凌行為展現反對態度，願意出聲制止、挺身對抗，或是願意公開展現對受害者的關懷、支持，則有機會削弱霸凌者的行動。

旁觀者的吆喝行為和救助行為有其重要性，因此在傳統霸凌的領域之中，影響旁觀者反應的因子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如：Padgett & Notar, 2013; Pozzoli & Gini, 2013; Salmivalli et al., 2011）。在網路霸凌的領域之中，雖然旁觀者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相關研究卻相當稀少（Lo Cricchio et al., 2021）。有些研究借用 Latané 與 Darley（1970）對危機事件提出的旁觀者介入模式（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來對網路霸凌進行解釋（如：Kazerooni et al., 2018; Liu et al., 2021），該模式認為旁觀者目睹危機事件後會經歷知覺事件、評估危機、評估責任、評估策略、到最後實際介入的五個階段。

BIM 模式對旁觀者的內在心理歷程做了完整的詮釋，然而要用以解釋網路霸凌現象中的旁觀者行為，仍有其不足。網路霸凌是以網路作為載體，與傳統霸凌或一般危機事件特性不同，影響旁觀者介入的因子也有所不同，例如網路具有非面對面接觸的特性，旁觀者難以直接觀察到受害者的情緒反應及其受到的傷害，因此容易忽略事件的嚴重程度（Liu et al., 2021）。再者，網路「公開」的特性，則使網路霸凌事件中的旁觀者人數被極大化，個別旁觀者的責任遭到分散，認為進行救助並非自己的義務，或是認為自己的行為對於遏止／強化事件沒有影響，此種責任分散導致道德約束被鬆綁的現象，Bandura（1990, 1999, 2002, 2016）稱之為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的一種。最後，網路霸凌是較為新興的社會現象，許多網路使用者對網路霸凌的定義、責任、樣態、影響、破壞性都不熟悉，可能因此忽略霸凌正在發生，或是錯誤評估事件需要被介入的程度，有鑑於此，旁觀者是否具有網路霸凌的辨識能力（cyberbullying awareness）、能否正確辨識出網路霸凌，也會影響其行為反應的意圖（Asanan et al., 2017）。

BIM 模式以及上述的討論都只聚焦於旁觀者個人的內在認知歷程，並未考量受害者本身因素對旁觀者的影響，近年來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網路霸凌的領域，都有研究指出受害者行為也會影響到旁觀者的反應傾向（如：Chen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9）。鑑於以上之不足，本研究在 BIM 模式的基礎上，依據網路霸凌的特性探討旁觀者在目睹霸凌事件之後，其網路道德疏離程度、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如何交互影響其行為反應的傾向，藉由此探討既能補充理論之不足，也能在實務上提供更有效的策略來提高旁觀者的救助意圖、降低吆喝意圖，減少更多網路霸凌的憾事發生。

(一) 旁觀者反應

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在網路霸凌事件中，旁觀者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旁觀者在目睹霸凌事件後採取何種行為反應對霸凌的後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旁觀者的行為反應主要可區分為救助行為（supporting behaviors）以及吆喝行為（reinforcing behaviors）兩種（Bastiaensens et al., 2014; Salmivalli et al., 2011），以下分述：

1. 救助行為

救助行為指旁觀者對霸凌行為展現反對的態度或是挺身制止，又或是對受害者展現出正向的關懷、支持。在網路的情境之中，例如在網路上留言安慰受害者、檢舉涉及霸凌的貼文、私訊提供受害者相關支持等都是救助行為的一種。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在霸凌事件中一向被視為制止霸凌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Padgett & Notar, 2013; Salmivalli et al., 2011），即使不一定能完全遏止霸凌，旁觀者的支持也能成為受害者的保護因子，降低霸凌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受害者因為壓力、憤怒、報復心理而進一步去攻擊他人，成為雙重角色者（bully-victims）（Ng et al., 2022; Sung et al., 2018）。

2. 吆喝行為

泛指旁觀者給予霸凌行為正向的回饋，包含直接對霸凌行為表示鼓勵、讚許，或是在網路上透過按讚、分享、轉發等行為，間接展現對霸凌事件的正面態度，都屬吆喝行為的一類。在霸凌事件中，旁觀者的吆喝行為通常會提高霸凌事件的嚴重程度，或是使旁觀者產生觀察學習引發更多霸凌事件（Ng et al., 2022; Salmivalli et al., 2011）。此外，吆喝行為也被證實會對受害者帶來負面影響，使受害者出現更多憂鬱、焦慮情緒，甚至使受害者產生自我責怪（self-blaming）的心理，懷疑自己是否「應該」被霸凌，導致更負向的自我概念（Salmivalli, 2010）。

(二) 旁觀者反應的內在歷程

要了解有哪些因子會影響旁觀者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的反應，就必須先瞭解旁觀者從知覺到實際反應之間的內在歷程。1964年 Kitty Genovese 在紐約的街頭遭到謀殺，當時有 38 名路人目睹犯案過程的發生卻無人伸出援手，此現象引發了心理學家對旁觀者行為進行大量研究（如：Darley & Latané, 1968; Latané & Darley, 1968, 1970）。其中 Latané 與 Darley（1970）便因為此事件提出了五階段的旁觀者介入模式（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該模式至今仍在研究中被頻繁使用，且廣泛的應用在例如酒駕（Rabow et al., 1990）、性侵（Burn, 2009）、器官捐贈（Anker & Feeley, 2011）、環境保護（Anker & Feeley, 2011）、霸凌（Nickerson et al., 2014）、網路霸凌（Kazerooni et al., 2018）等各種不同的道德情境之中。

BIM 模式認為旁觀者從知覺事件到實際展開行動，會經歷五個階段的內在歷程，以下分述：

1. 知覺事件階段

旁觀者要展開行動，首先事件要能引起旁觀者的注意，若事件未引起旁觀者注意，例如旁觀者正在忙碌而疏忽，自然就不會救助（Darley & Batson, 1973），若事件能引起旁觀者注意，則會進入下一個階段。過去研究也顯示，當環境中有太多干擾、事件中缺乏明顯受害者等，旁觀者比較不會注意到危機事件的發生（Nickerson et al., 2017）。杜淑芬等人（2021）訪談 27 位輔導教師，其結論也指出輔導教師難以介入霸凌事件的主因，是難以辨識霸凌是否正在發生。

2. 評估危機階段

在第二階段，旁觀者會依照現有的資訊對眼前事件進行危機程度的評估，若是旁觀者認為該事件並不危急、不會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傷害，或是因為情境較為模糊，能夠掌握的資訊太少，

導致旁觀者無法確定事件的危急程度，都會降低旁觀者進行救助的可能性（Clark & Word, 1974; Solomon et al., 1978）。反之，若旁觀者認為該事件有一定的危急程度，就比較有可能進行救助，例如 Fischer 等人（2011）的後設分析就指出危機事件比非危機事件更能引起旁觀者的注意，也有更高的可能性引起旁觀者的救助行動。

3. 評估責任階段

此階段旁觀者會評估介入事件是否是自己應承擔的責任，若旁觀者認為事件與自己無關、有其他旁觀者會伸出援手，或是因為有其他冷漠的旁觀者存在，自己不會因此受到批判，便會傾向不對受害者進行救助（Darley & Latané, 1968）。反之，若是旁觀者能有「捨我其誰」的理念，願意承擔救助的責任，則較有可能對事件進行介入並進入下一階段的內在歷程。

4. 評估策略階段

旁觀者針對事件評估可行的救助策略，當旁觀者知道適當的援助方式，便比較有可能實際做出救助的決定，若缺乏適當的救助策略，或是假定自己的介入不會有用，則比較傾向忽略、不救助。例如 Clark 與 Word（1974）發現旁觀者知覺自己有沒有能力幫忙，會影響其介入危機事件的傾向。Fischer 與 Bilz（2019）發現教師對處理霸凌事件的自我效能，直接影響其在現實生活中介入霸凌事件的可能性。李佩珊與謝百淇（2020）發展的旁觀者介入課程，內涵中也強調讓有意願助人的旁觀者能夠獲得助人的策略和技巧。

5. 實際介入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是旁觀者實際執行救助的行動，在此階段旁觀者會評估各種介入策略所需付出的成本，例如時間、心力、危險性等。旁觀者在救助的過程中會不斷對付出成本進行再評估，決定是否繼續進行救助或停止介入。

經歷 BIM 模式的前三階內在歷程，旁觀者將產生救助／不救助的動機，在第四、第五階段則是與實際的行動策略較為相關。因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為旁觀者在不同情境下，選擇展開救助行為或是吆喝行為的動機，因此探究的焦點在於 BIM 模式的前三階段。

Chen 等人（2016）以紮根理論的方式探討臺灣國中生遇到霸凌事件時的介入歷程，其所提出的理論與 BIM 模式相互呼應。該研究的結果顯示旁觀者在選擇成為挺身者（進行救助行為），或是選擇成為局外人（忽略事件發生）之前，一樣會經歷注意事件、評估事件嚴重性、評估事件是否為自身的責任等歷程。在其研究中有 38% 的受訪者認為霸凌並不嚴重所以不需要救助，也有 21% 的人認為進行介入並非自己的責任而是老師的責任，因此不想救助。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也表示除了霸凌事件本身的嚴重性和責任感以外，受害者本身的行為和特質也會影響其反應，例如有 29% 的受訪者表示只有在受害者本身是無辜、沒有做錯事在先的情況下，才願意在霸凌發生時進行救助，由此可見 BIM 模式在臺灣的霸凌情境中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然而也要額外考量受害者本身行為的影響。

（三）旁觀者反應與霸凌辨識能力

在 BIM 模式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中，旁觀者必須先能夠注意、知覺到事件正在發生，並且對該事件的危急程度作出評估，然而將其應用在網路霸凌情境時會與一般危機事件有所不同。首先，由於網路霸凌屬於新興的社會現象，許多網路使用者對網路霸凌的定義較不熟悉，且學者間對於網路霸凌的定義也尚未有所定論（Chun et al., 2020; Shaikh et al., 2020），若旁觀者以傳統霸凌的定義檢視網路霸凌事件，將難以判斷其中是否有蓄意傷害、勢力不對等、重複、造成傷害等特性（Olweus, 1999, 2012; Slonje et al., 2013），且大多學者（如：Raskauskas & Huynh, 2015; Smith et al., 2008; Willard, 2007）認為網路霸凌包含煽動、騷擾／追蹤、詆毀、仿冒、洩密／欺騙、排擠等種類，與其他網路暴力、網路犯罪有許多重疊之處，卻與傳統霸凌的樣態（肢體、言語、關係）有所不同，易使網路使用者混淆。再者，網路霸凌具有非面對面的特性，旁觀者將難以評估事件對受害者造成

傷害的嚴重程度，網路上的資訊較為模糊，也使旁觀者難以釐清事件的始末，進而容易對事件做出錯誤的評估（Liu et al., 2021），將屬於網路霸凌的事件評估為不是網路霸凌。例如，在網路上看到別人的醜照被 po 上網路，旁觀者會難以判斷是否為朋友間的玩笑，而且如果以傳統霸凌中必須重複發生的定義來看，也可能認為 po 醜照屬於單一事件而不是霸凌，忽略了網路可以不斷被轉發，醜照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長期傷害的結果。因此在 BIM 模式的第一、第二階段，旁觀者是否能對網路霸凌投以關注並正確評估其危機程度，需考量旁觀者對網路霸凌是否具有一定的知能、能否正確辨識出網路霸凌。

Asanan 等人（2017）的研究指出，能正確辨識出網路霸凌的青少年比較不會成為網路霸凌者，在目睹網路霸凌時也比較願意對受害者提供協助。Steer 等人（2020）指出缺乏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的中學生分不清楚開玩笑和網路霸凌之間的界線，因此無法控管自身的網路使用行為。Elçi 與 Seçkin（2019）也指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不只能預防大學生變成網路霸凌的受害者，也能預防校園中的其他人（例如老師）受到學生的網路霸凌。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旁觀者的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其救助行為、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

（四）受害者行為、道德疏離與旁觀者反應

在 BIM 模式的第三個階段，旁觀者需要評估介入當前事件是否為自己的責任，若旁觀者認為此事件並非自己的責任就比較不會進行介入。在網路霸凌的情境之中，因為網路霸凌中每個看見貼文者都是旁觀者，旁觀者的數量被極大化，因此對個別的旁觀者而言，容易覺得救助並非自己的責任，抑或是期待有其他旁觀者會伸出援手。另一方面，網路霸凌中時常有為數眾多的旁觀者在旁吆喝，例如一篇霸凌的貼文可能有成千上萬人按讚、轉傳、分享、留言，容易使旁觀者覺得自己的吆喝行為隱身於人群之中，不會對受害者造成傷害，或是不需要負起相對應的責任。

近年來許多網路霸凌的研究便以 Bandura（1990, 1999, 2002, 2016）的道德疏離理論來對此種網路霸凌中的特殊現象進行解釋，希望理解為何人們在網路上的行為會變得比在生活中更為暴力（見：Bussey et al., 2015; Fang et al., 2020）。Bandura 於 1990 年首先提出八種道德疏離的信念，這些信念會使個體去忽視、轉移內在道德標準所給予的束縛，以下對這八項信念進行分述：

1. 道德辯解（moral justification）

行為人宣稱自己的行為具有利社會性、符合道德的標準。

2. 修飾說詞（euphemistic labeling）

行為人利用委婉的說詞來修飾、淡化自身行為的嚴重性。

3. 有利比較（advantageous comparisons）

行為人將自身的行為與更具傷害性的行為比較，宣稱行為的目的是阻止其他更具傷害性的行為發生。

4. 責任推諉（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

宣稱自身的行為並非出自本意，或是宣稱行為是受到他人的指令，使個人得以規避行為的責任。

5. 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宣稱行為的責任應由群體中的所有人一同承擔，分散自身的責任。

6. 忽視或扭曲後果（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

行為人刻意忽略、忽視或淡化自身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7. 去人性化 (dehumanisation)

行為人貶低受害者的人格、將受害者視為「次等的」、「非人的」，規避自身的道德約束。

8. 怪罪受害者 (attribution of blame)

行為人宣稱事件的結果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受害者應該為自身受害的結果負責。

不論在傳統霸凌或是網路霸凌中，道德疏離程度高的旁觀者都比較容易對受害者漠不關心，甚至產生吆喝行為（賴怡君、程景琳，2020；Bjärehed et al., 2020；Kyriacou & Zuin, 2018；Lo Cricchio et al., 2021；Perren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2；Robson & Witenberg, 2013）。網路霸凌與道德疏離有關的原因有三，首先，如同前文所述，旁觀者難以直接目睹網路霸凌對受害者的傷害及影響，在旁觀者無法確認受害者是否受傷的情況下，容易使旁觀者淡化自身的吆喝行為的嚴重性，產生「修飾說詞」及「忽視後果」的現象。其二，旁觀者眾多的特性容易使個人認為介入並非自己的責任，或是認為有其他人會出手介入，導致個人出現「責任推諉」及「責任分散」的現象。最後，當受害者本身的行為可能有值得被批評之處時，缺乏實際的接觸更容易使旁觀者產生「去人性化」、「怪罪受害者」，或是宣稱自己的霸凌行為或吆喝行為是在主持正義，具有利社會性，產生「有利比較」的疏離信念。

在實證層面，Bussey 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當這些道德疏離信念出現，網路上的暴力行為、霸凌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會相對的提升。Fang 等人（2020）等人發現道德疏離信念在情緒麻木（numb）與網路霸凌的關係中扮演著中介的角色。Koehler 與 Weber（2018）發現網路霸凌旁觀者有怪罪受害者的傾向時，會對受害者展現較少的支持行為。賴怡君與程景琳（2020）則以國小學童為受試者，發現在傳統肢體霸凌及關係霸凌的情境中，道德疏離與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呈現負相關、與吆喝行為呈現正相關。

（五）小結

綜合 BIM 模式與上述有關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和受害者本身行為的探討，本研究認為在旁觀者目睹網路霸凌事件發生時，應該先考量旁觀者本身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如果沒有一定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便容易忽略事件的發生、輕忽事件嚴重性、對吆喝行為沒有自覺，若具有一定的辨識能力，便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去針對個人是否有責任以及受害者行為是否值得被霸凌／被救助去進行評估。在後面的兩個階段，旁觀者是否具有道德疏離信念以及受害者本身行為是否正當，會影響旁觀者的行為傾向，若是受害者本身的行為不當，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便容易以怪罪受害者、貶低受害者、聲稱霸凌具有利社會性等機制，逃避救助責任以及自身道德感對吆喝行為的譴責；若受害者是單純受害（行為沒有不當），即使是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也難以用以上的機制來合理化霸凌事件。

因此本研究設計兩個網路霸凌情境，第一個情境為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以下簡稱情境一），第二個情境為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以下簡稱情境二，詳細描述見研究工具一節），目的在於探討不同情境下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對救助行為／吆喝行為的影響，並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在情境一，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其救助行為，但不受到道德疏離的調節。

假設二：在情境一，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但不受到道德疏離的調節。

假設三：在情境二，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正向預測其救助行為，且受到道德疏離的調節。

假設四：在情境二，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吆喝行為，且受到道德疏離的調節。

方法

(一) 研究流程及參與者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現於國內大學就讀之大學部學生。不同年齡層對網路的使用習慣不同、受到網路霸凌的風險也有所不同，Shaikh 等人（2020）的文獻回顧指出過去的網路霸凌研究多以青少年作為樣本，忽略大學生樣本的重要性，且根據我國科技部委託張卿卿（2020）的調查顯示，18—19 歲正值大學階段的受試者，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高達 5 小時 12 分鐘，為各年齡層之中最高，調查中也顯示線上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等容易發生網路霸凌的媒介，是大學生使用網路時最常使用的功能。由此可見，大學生可說是暴露於網路霸凌風險中最高的族群，在研究中卻時常被忽略，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抽樣方式採用網路問卷立意取樣，由研究者在 Facebook、PTT、Dcard 三種社群平台貼文招募受試者，受試者閱讀問卷資訊後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為提升填答率，本研究提供抽獎活動，凡填答完畢者皆可參與抽獎，獎項包含行動電源、電影票、飲料兌換卷及超商商品卡。

參與研究的受試者會依序填答《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以及《網路道德疏離量表》，填答完畢後再填寫兩份《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第一份為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第二份則是受試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實際回收有效樣本 1,393 份，樣本統計資料見表 1。

表 1
兩研究樣本背景資料一覽表 ($N = 1,393$)

變項	類別	人數 (n)	百分比 (%)
學制	一般大學	1145	82.2%
	科技大學	233	16.7%
	專科學校	12	0.9%
	未答	3	0.2%
每日使用網路	2 小時以下	19	1.3%
	2 ~ 5 小時	433	31.1%
	5 ~ 8 小時	588	42.2%
	8 小時以上	350	25.1%
	未答	3	0.2%
求學霸凌經驗	是	189	13.5%
	否	1204	86.4%
求學受霸凌經驗	是	498	35.7%
	否	895	64.2%
網路霸凌經驗	是	54	3.8%
	否	1339	96.1%
網路受霸凌經驗	是	166	11.9%
	否	1227	88%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有三，分別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網路道德疏離量表》及《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以下分述：

1. 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

本研究採用趙映嫻（2022）所編製《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測驗》來測量受試者的霸凌辨識能力，該測驗包含 14 題情境題，受試者先閱讀一段網路霸凌定義，接著瀏覽各項情境題並回答該情境是否屬於網路霸凌的一種。範例如「A 在臉書上發布公開貼文寫道：『B 是一個聽不懂人話的畜牲。』，B 無法刪除，也無法阻止該貼文的傳播。」，受試者依照情境回答「確是網路霸凌」或「不是網路

霸凌」，受試者若正確辨識出霸凌情境便得 1 分，錯誤辨識則得 0 分，滿分 14 分，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霸凌辨識能力越佳。

該量表以 Rasch 二元計分模式 (Rasch, 1960) 驗證其信效度，題目分離係數 (item separation reliability) 為 .99，受試者分離係數 (person separation reliability) 為 .06，infit MNSQ 介於 0.99 ~ 1.02 之間，outfit MNSQ 介於 0.93 ~ 1.04 之間，符合研究者所建議之標準 (Wright et al., 1994)。

2. 網路道德疏離測驗

《網路道德疏離測驗》翻譯自 Paciello 等人 (2020) 依據 Bandura (1990, 1999, 2002, 2016) 的理論所編製的測驗，該量表由八題與網路行為有關的敘述組成，每題對應理論中的一項道德疏離信念。計分方式為李克特式 5 點量表，受試者閱讀題目的敘述後，依照其同意的程度進行回答。範例如「在網路上假冒同學／朋友的身份只是一種朋友間的樂趣。」，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 分代表非常同意，8 個題目的加總分數越高，代表其網路道德疏離的程度也越高。

該量表由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的檢核，結果顯示其 Chi Square = 24.429、 $df = 20$ 、 $p = .224$ 、RMSEA = 0.016 (95% CI = 0.000—0.035)、 $p = .999$ 、CFI = .996、SRMR = .514，組成信度 (component reliability) 為 .81，符合研究者 (Raykov, 1997) 所建議的水準。本研究將其翻譯為中文版因此重新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驗證，結果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單一個因素可以解釋 46% 的變異量，其中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5，內部一致性 $\alpha = .81$ 。

3. 網路霸凌介入意願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改編自 Bastiaensens 等人 (2014) 所編製的量表，原量表包含 19 題救助行為及 5 題叱喝行為，範例如「我會私訊霸凌者告訴他網路霸凌是不對的」。計分方式皆為李克特式 7 點量表，受試者閱讀題目敘述後，依照其同意的程度進行回答，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 分代表非常同意，題目的加總分數越高，代表進行救助行為或是叱喝行為的意願也越高。因本研究所設定的情境中霸凌者、受害者及旁觀者並非同校同學，因此刪除量表中在學校進行的題項，例如「我會到學校去當面安慰受害者」，最後留下 11 題支持行為及 5 題叱喝行為，並將量表改為 5 點計分以方便受試者作答。

本研究進一步將《網路霸凌反應傾向量表》分為兩種情境，第一種為單純的網路霸凌情境，題幹敘述為「當你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遭到他人以貼文的形式公開霸凌時，你會採用以下哪些做法。」；第二種為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而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境，題幹敘述為「當你的朋友因為做了違規的事情 (例如亂丟垃圾) 而在 Facebook 上遭到他人以貼文的形式公開霸凌時，你會採用以下哪些做法。」。

Bastiaensens 等人 (2014) 驗證其研究工具之內部一致性係數，發現不論是支持行為或是叱喝行為的 α 係數皆高於 .72，顯示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將該量表進行過刪減並新增情境二，因此重新驗證其內部一致性。結果顯示情境一支持行為 $\alpha = .83$ ，叱喝行為 $\alpha = .79$ ；情境二支持行為 $\alpha = .87$ ，叱喝行為 $\alpha = .86$ 。

(三) 分析方法

在進行主要假設驗證之前，本研究先進行描述統計以及相依樣本 t 檢定，檢測受試者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 (情境一) 和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遭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 (情境二)，救助行為／叱喝行為為是否有顯著差異。

接著，為回答本研究所要驗證之假設一／假設二，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一的救助行為／叱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救助行為／叱喝行為，便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Hayes, 2022) 中的 model 1 檢驗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叱喝行為間的調節效果。

為回答本研究所要驗證之假設三／假設四，本研究同樣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的救助行為／叱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並以 PROCESS for SPSS (Hayes, 2022) 中的 model 1 檢驗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二救助行為／叱喝行為間的調節效果。

結果

表 2 為本研究各個變項之描述統計結果以及相關矩陣，由表中可以看出受試者平均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高（滿分 14 分， $M = 10.72$, $SD = 1.39$ ），道德疏離程度低（五點量表， $M = 1.41$, $SD = 0.41$ ），救助行為程度中等（五點量表，情境一 $M = 2.76$, $SD = 0.49$ ；情境二 $M = 2.66$, $SD = 0.54$ ），吆喝行為程度低（五點量表，情境一 $M = 1.57$, $SD = 0.57$ ；情境二 $M = 1.50$, $SD = 0.61$ ）。

本研究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檢驗受試者在情境一與情境二的救助行為／吆喝行為是否有所差異，結果顯示救助行為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確實存在顯著差異（ $t = 9.93$, $p < .00$ ），吆喝行為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也確實存在顯著差異（ $t = 6.85$, $p < .00$ ）。

表 2
描述統計和相關矩陣

變項	1	2	3	4	5	6
1. 霸凌辨識能力	1.00					
2. 道德疏離	-0.10**	1.00				
3. 情境一救助行為	0.00	-0.14**	1.00			
4. 情境一吆喝行為	-0.17**	0.43**	0.00	1.00		
5. 情境二救助行為	-0.06*	-0.10**	0.75**	0.06*	1.00	
6. 情境二吆喝行為	-0.14**	0.41**	0.01	0.75**	0.07**	1.00
M	10.72	1.41	2.76	1.57	2.66	1.50
SD	1.39	0.41	0.49	0.57	0.54	0.61

* $p < .05$. **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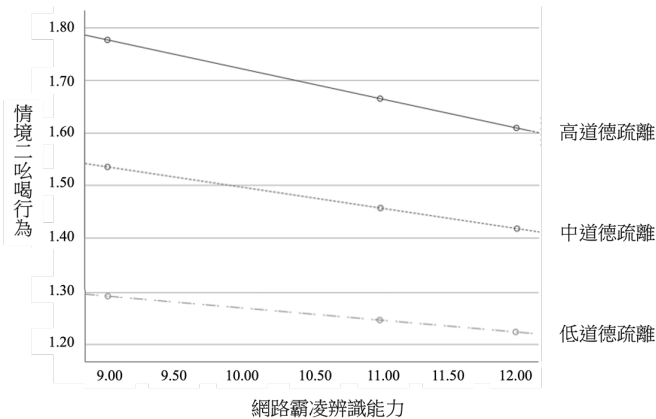
根據上表 2，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間相關性並未顯著（ $r = .00$, $p = .99 > .05$ ），此結果已與本研究之假設一不符，因此不再進一步執行迴歸分析以及調節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二，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一吆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一中的吆喝行為（調整後 $R^2 = .03$, $F = 40.30$, $\beta = -.17$, $p < .001$ ），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 來檢視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一之吆喝行為，但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吆喝行為間並沒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2$, $p = .23 > .05$ ），與本研究之假設二相符。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三，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救助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二中的救助行為（調整後 $R^2 = .00$, $F = 4.75$, $\beta = -.06$, $p = .03 < .05$ ），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 來檢視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二之救助行為，但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二救助行為間並沒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2$, $p = .29 > .05$ ），與本研究之假設三不符。

為驗證本研究主要假設四，研究者以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為自變項，情境二吆喝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簡單線性迴歸。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受試者在情境二中的吆喝行為（調整後 $R^2 = .02$, $F = 29.57$, $\beta = -.14$, $p < .001$ ），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以 PROCESS for SPSS model 1 來檢視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預測情境二之吆喝行為，且道德疏離在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二吆喝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果（coefficient = $-.04$, $p = .03 < .05$ ），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四相符。研究者以 SPSS 28.0 將結果繪製為圖 1，觀察圖 1 的三條線可以發現斜率由低到高分別為低道德疏離組、中道德疏離組、高道德疏離組，也就是說，隨著道德疏離程度的增加，霸凌辨識能力對情境二吆喝行為的抑制效果也跟著越強。

圖 1
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和吆喝行為間的關係



討論

本研究參考 BIM 旁觀者介入模式以及網路霸凌的特性，認為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時應該會經歷辨識網路霸凌、評估自身責任、評估受害者行為三個階段，這些階段分別受到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受害者行為三個因子的影響，最終影響旁觀者對受害者進行救助或是吆喝。依此，本研究提出四個假設並進行驗證，結果顯示：（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情境一救助行為間的相關性並未顯著，與假設一不符。（二）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其情境一吆喝行為，且不受道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二相符。（三）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情境二救助行為，但不受到道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三不符。（四）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負向預測情境二吆喝行為，且受到道德解離的調節，與研究假設四相符。

（一）旁觀者的救助行為傾向

由研究結果一、三可以發現，不論是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或是受害者因為違反社會規範而受到網路霸凌的情境中，旁觀者對受害者皆只有中等的救助傾向，且救助傾向不受到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的影響。換句話說，不論受害者是否認為眼前的事件屬於網路霸凌事件，其救助傾向都是相同的。過去研究（Asanan et al., 2017; Elçi & Seçkin, 2019; Steer et al., 2020）曾指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能避免旁觀者成為霸凌者、降低自身成為受害者的機會，然而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霸凌辨識能力能提高旁觀者的救助意願。此結果說明，能辨別出眼前事件是否為霸凌事件僅是救助行為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否願意採取救助行動可能受到其他因子的影響，例如過去研究曾顯示同理心（Machackova & Pfetsch, 2016）、知覺事件嚴重度（Fischer et al., 2011; Liu et al., 2021）、救助自我效能（Clark & Bussey, 2020; Knauf et al., 2018）等因子，對旁觀者救助行為有正向的影響，未來研究宜針對影響救助行為的不同變項進行探討。

相依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旁觀者在情境一的救助傾向顯著高於情境二，也就是當受害者沒有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時旁觀者比較願意救助，此結果與 Liu 等人（2019）透過實驗操弄的結果以及 Chen 等人（2016）透過質性訪談得到的結果一致。相關矩陣的結果進一步顯示，比起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與旁觀者的救助傾向有比較高的相關性，可以說明在救助傾向的部分，受害者本身的行為以及道德疏離信念，比起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有更關鍵的影響。

(二) 旁觀者吆喝行為傾向

研究結果二、四顯示，不論是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或是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而受網路霸凌的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都能負向預測旁觀者的吆喝行為。換句話說，當旁觀者能夠意識到眼前的事件屬於網路霸凌事件時，比較不會對霸凌的貼文進行按讚、轉發、分享、留言，此結果與 Asanan 等人 (2017) 的研究結果相同，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確實對吆喝行為具有抑制效果。

為進一步了解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過去時常被忽略的受害者行為以及旁觀者道德信念的影響。研究者以 PROCESS for SPSS 進行調節分析，發現只有在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中，道德疏離信念會調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與吆喝行為之間的關係，在一般的網路霸凌情境中則否。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二、假設四相符，顯示在旁觀者單純被霸凌、沒有違規行為在先的情境下，道德疏離不會調節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吆喝行為的抑制效果。在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狀況下，若是旁觀者存有道德辯解、去人性化、怪罪受害者等道德疏離的信念，又因缺乏霸凌辨識能力而對自身的吆喝行為缺乏覺察，此時旁觀者容易將吆喝行為合理化為正義之舉，道德感難以對自身行為形成約束，旁觀者便會產生較高的吆喝行為；相反的，若旁觀者具備辨識霸凌行為的能力，即便存有道德疏離的信念也便比較不會將吆喝行為合理化，能對自身的行動保持節制 (Bandura, 2016)。

(三) 實務應用建議

1. 提高旁觀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網路霸凌辨識能力對旁觀者的救助行為沒有直接影響，但對抑制吆喝行為具有一定的功能，因此提高網路使用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有其重要性。Elçi 與 Seçkin (2019)、Smith 等人 (2014) 也強調要遏止網路霸凌不僅要提高學生的辨識能力，教職員、行政人員也應該要受到充分的訓練，方能在網路霸凌發生時立刻知覺並進行處遇。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對系統中的所有人員進行網路霸凌的防制教育，提高網路霸凌的辨識能力，降低旁觀者成為吆喝者的可能。

具體作法上，Sung 與 Chen (2017) 將 427 位師資培育生分為四組進行不同的霸凌辨識能力訓練，結果顯示僅提供霸凌定義或是霸凌行為特徵的組別，其霸凌辨識能力與未接受訓練的控制組無異，唯有透過疑似霸凌案例的研討，讓師資培育生有機會對於不同案例進行討論、反思、澄清，其霸凌辨識能力才能顯著的提升。因此本研究建議各級學校及家長，在進行網路霸凌防制教育時，應多加利用實務案例進行研討，尤其應該讓學習者有機會針對案例中的情境，進行討論、對話，並且釐清旁觀者對各種網路霸凌的迷思 (例如：匿名留言者無法被查出身份)，在經歷或是目睹網路霸凌時，才能正確的辨識、覺察。

2. 對於違規的受害者保持公正

本研究發現即使是在網路霸凌的情境之中，旁觀者一樣會評估受害者行為的正當性，若是受害者先違反社會規範，旁觀者則比較傾向不救助且容易在旁吆喝。值得注意的是，網路霸凌和傳統霸凌不同，網路上的資訊往往較為片面，旁觀者缺乏對事件的了解與對受害者的認識，容易對受害者行為作出過於武斷的評價，例如 Liu 等人 (2019) 透過實驗操弄，請旁觀者聚焦在文章中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部分，結果顯示面對同樣的事件，實驗組相較於控制組有更高的攻擊傾向，即使是富有同理心的旁觀者也不一定會對違規的受害者提供救助。

因此，本研究建議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應盡可能地理解事件的原委，收集正反資訊，不過早地對受害者的行為作出評價。而新聞媒體，甚至是所有的自媒體，也應該負起身為新聞傳媒應有的道德責任，力求公正、客觀看待受害者的行為，不為了新聞流量刻意放大受害者的違規行為，進而引起更多的旁觀者群起攻之，塑造「霸凌有理」的社會風氣。

3. 注意道德疏離信念

本研究發現在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下，高道德疏離者比低道德疏離者有更多吆喝行為，此結果與 Lo Cricchio 等人（2021）、Paciello 等人（2020）的研究結果一致。此外，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旁觀者的道德疏離信念與網路霸凌辨識能力會交互影響吆喝行為，相較於低道德疏離者，霸凌辨識能力對高道德疏離者的吆喝行為有更顯著的抑制效果。此結果顯示霸凌辨識能力低且道德疏離程度高的旁觀者，可能將網路霸凌認定為「網路公審」，屬於正義之舉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隨著霸凌辨識能力提高，即使是道德疏離的旁觀者也會意識到自身的攻擊行為屬於霸凌，不應該在一旁吆喝。

依此結果，本研究建議在網路霸凌防制教育中，教師可運用道德討論教學法，在討論的過程中應注意學習者是否存有道德疏離的信念，對於高道德疏離的學習者，應讓其明白不論受害者是否有錯，網路公審都屬於網路霸凌的一種，不該被視為追求正義的手段之一。倘若道德疏離信念難以被改變，教師可嘗試提高學習者的網路霸凌辨識能力，使其對自身行動有所自覺，且能明白霸凌行為的傷害性、法律責任，以及行為後果，如此才能對高道德疏離者的吆喝行為進行抑制。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包含三項限制。首先，本研究為第一篇探討網路霸凌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信念和受害者行為如何交互影響旁觀者反應傾向的研究，且本研究僅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可能難以推論至其他群體。未來研究宜針對對不同群體的網路使用者，重複驗證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

其次，本研究是以自陳式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因此只能得知受試者目睹網路霸凌後的行為傾向，無法代表旁觀者實際產生的行為反應，未來研究可以直接邀請網路霸凌事件中的挺身者和吆喝者作為受試者，以回溯性（retrospective study）的方式探討上述因子對其行為的影響，強化本研究結果與實際救助行為／吆喝行為間的關聯。

最後，本研究發現受害者本身的行為會影響旁觀者的反應傾向，然而本研究僅設計一種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情境，未來研究可去探討不同嚴重程度、不同形式的違規行為（例如亂丟垃圾 VS. 酒駕肇事），如何影響旁觀者的反應傾向，也可評估旁觀者知覺受害者違反社會規範的程度，藉此更全面的了解違規行為如何影響旁觀者在目睹網路霸凌事件時，選擇挺身救助或是選擇吆喝起哄。

（五）結論

網路霸凌為當前社會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正如同傳統霸凌，旁觀者在網路霸凌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因為網路霸凌定義不清、旁觀者眾多、受害者的傷無法被看見等原因，旁觀者往往選擇袖手旁觀甚至在旁吆喝。本研究結合 BIM 旁觀者介入模式以及近年對網路霸凌現象的探討，設計兩種不同情境，探討不同情境中網路霸凌辨識能力、道德疏離以及受害者行為，如何交互影響旁觀者的反應傾向。本研究的成果不僅增加對旁觀者反應傾向的理解，更可實際應用於網路霸凌的預防、介入以及處理。

參考文獻

- 李佩珊、謝百淇（2020）：〈為弱勢者發聲：高中生之偏見察覺力與旁觀者介入知能課程探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8（1），39–73。[Lee, P.-S., & Shein, P.-P. (2020). Speaking up for the disadvantaged: Empower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ejudice awarenes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 behavi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8(1), 39–73.]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
- 杜淑芬、鄧文章、陳亦鳳（2021）：〈國中輔導教師介入關係霸凌事件的輔導困境與策略〉。

- 《教育心理學報》，53，223–249。[Tu, S.-F., Teng, W.-C., & Chen, Y.-F. (2021). Counselors'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when intervening in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223–249.]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10](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10)
- 張卿卿（2020）：〈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二次（2018）：媒介使用與社會互動（D00176）〔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76-1> [Chang, C.-C. (2020). *The 2018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Phase Two, Year Two): Media use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D00176) [data file].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76-1>]
- 趙映嫻（2022）：《網路霸凌行為情境辨識量表之建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 [Chao, Y.-M. (2021). *Validation of cyberbullying identification scal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賴怡君、程景琳（2020）：〈國小學童同理心與霸凌旁觀者行為傾向之關係：以道德疏離為中介變項〉。《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1，28–56。[Lai, I.-C., & Cheng, C.-L. (2020). Moral disengagement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s of empathy and bystander behaviors in elementary student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21, 28–56.] [https://doi.org/10.6246/JHDFS.202012_\(21\).0002](https://doi.org/10.6246/JHDFS.202012_(21).0002)
- Aboujaoude, E., Savage, M. W., Starcevic, V., & Salame, W. O. (2015). Cyberbullying: Review of an old problem gone vir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7(1), 10–18.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5.04.011>
- Anker, A. E., & Feeley, T. H. (2011). Are nonparticipants in prosocial behavior merely innocent bystanders? *Health Communication*, 26(1), 13–24. <https://doi.org/10.1080/10410236.2011.527618>
- Asanan, Z. Z. T., Hussain, I. A., & Laidey, N. M. (2017). A study on cyberbullying: Its forms, awareness and moral reasoning among y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5), 54–58. <https://doi.org/10.11648/j.ijics.20170205.11>
- Bandura, A. (1990). Selective activation and disengagement of moral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1), 27–4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90.tb00270.x>
-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303_3
- Bandura, A. (2002).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2), 101–119.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 Bandura, A. (2016). *Moral disengagement: How people do harm and live with themselves*. Worth Publishers.
- Bastiaensens, S., Vandebosch, H., Poels, K., Van Cleemput, K., DeSmet, A., & De Bourdeaudhuij, I. (2014).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to bystanders'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help the victim or reinforce the bull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259–271.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10.036>

- Bauman, S., & Del Rio, A. (2006). Preservice teachers' responses to bullying scenarios: Comparing physical, verbal,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1), 219–231.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98.1.219>
- Beckman, L., Hagquist, C., & Hellström, L. (2012). Does the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matic health problems differ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 17*(3-4), 421–434. <https://doi.org/10.1080/13632752.2012.704228>
- Bjärehed, M., Thornberg, R., Wänström, L., & Gini, G. (2020).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direct bullying, direct bullying, and pro-aggressive bystander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40*(1), 28–55.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18824745>
- Burn, S. M. (2009). A situational model of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through bystander intervention.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60*(11-12), 779–792.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8-9581-5>
- Bussey, K., Fitzpatrick, S., & Raman, A. (2015).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elf-efficacy in cyberbullying.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4*(1), 30–46.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4.954045>
- Chen, J.-K., & Chen, L.-M. (2020). 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 of school violence and nonattendance due to school violence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 Rasch model approach.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9*(2), 177–191.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9.1568882>
- Chen, L.-M., Chang, L. Y. C., & Cheng, Y.-Y. (2016). Choosing to be a defender or an outsider in a school bullying incident: Determining factors and the defending proces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7*(3), 289–302. <https://doi.org/10.1177/0143034316632282>
- Chun, J., Lee, J., Kim, J., & Lee, S. (2020). An international systematic review of cyberbullying measurem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3*, Article 10648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485>
- Clark, M., & Bussey, K. (2020).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defending cyberbullying victim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9*, Article 10634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340>
- Clark, R. D., & Word, L. E. (1974). Where is the apathetic bystander?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3), 279–287. <https://doi.org/10.1037/h0036000>
- Darley, J. M., & Batson, C. D. (1973).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 study of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variables in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1), Article 100. <https://doi.org/10.1037/h0034449>
-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https://doi.org/10.1037/h0025589>
- Elçi, A., & Seçkin, Z. (2019).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for mitigating consequ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5), 946–960.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6646095>
- Fang, J., Wang, X., Yuan, K.-H., Wen, Z., Yu, X., & Zhang, G. (2020).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 of empath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7, Article 10982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0.109829>
-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Vogrincic, C., Kastenmüller, A., Frey, D., Heene, M., Wicher, M., & Kainbacher, M. (2011).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17–537. <https://doi.org/10.1037/a0023304>
- Fischer, S. M., & Bilz, L. (2019). Teachers' self-efficacy in bully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ir probability of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56(5), 751–764. <https://doi.org/10.1002/pits.22229>
- Hamm, M. P., Newton, A. S., Chisholm, A., Shulhan, J., Milne, A., Sundar, P., Ennis, H., Scott, S. D., & Hartling, L. (2015). Prevalence and effect of cyberbullying o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scoping review of social media studies. *JAMA Pediatrics*, 169(8), 770–777. <https://doi.org/10.1001/jamapediatrics.2015.0944>
- Hayes, A. F. (2022).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3rd ed.). Guilford Press.
- Jacobsen, K. E., & Bauman, S. (2007). Bullying in schools: School counselors' responses to three types of bullying inci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1(1), 1–9. <https://doi.org/10.1177/2156759X0701100101>
- Kazerooni, F., Taylor, S. H., Bazarova, N. N., & Whitlock, J. (2018). Cyberbullying bystander intervention: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retweeting predict likelihood of helping a cyberbullying victi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3(3), 146–162. <https://doi.org/10.1093/jcmc/zmy005>
- Kemp, S. (2022, July 21). *Digital 2022: July global statshot report*. DataReportal.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july-global-statshot>
- Knauf, R.-K., Eschenbeck, H., & Hock, M. (2018). Bystanders of bullying: Social-cognitive and affective reactions to schoo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2(4), Article 3. <https://doi.org/10.5817/CP2018-4-3>
- Koehler, C., & Weber, M. (2018). “Do I really need to help?!” Perceive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victim blaming, and bystanders'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victim.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2(4), Article 4. <https://doi.org/10.5817/CP2018-4-4>
- Kowalski, R. M., & Limber, S. P. (2013).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3(1), S13–S20.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2.09.018>
- Kyriacou, C., & Zuin, A. (2018). Cyberbullying bystanders and moral engagement: A psychosocial analysis for pastoral care.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36(2), 99–111. <https://doi.org/10.1080/02643944.2018.1453857>
-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68).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215–221. <https://doi.org/10.1037/h0026570>
-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70).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Appleton-Century

Crofts.

- Lee, C., & Shin, N. (2017).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and predictors of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8*, 352–35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1.047>
- Liu, C.-H., Huang, P.-S., & Tzeng, J.-Y. (2019). When an unfortunat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incident is cyberbullied by the public, even empathetic people can be bystanders: The role of perception of unusual behavio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3*, 84–9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8.12.006>
- Liu, C.-H., Yin, X.-R., & Huang, P.-S. (2021). Cyberbullying: Effect of emergency perception on the helping tendencies of bystander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62*, Article 101627. <https://doi.org/10.1016/j.tele.2021.101627>
- Lo Cricchio, M. G., García-Poole, C., te Brinke, L. W., Bianchi, D., & Menesini, E. (2021).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yberbullying involv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2), 271–311.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20.1782186>
- Machackova, H., & Pfetsch, J. (2016). Bystanders' responses to offline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The role of empathy and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2), 169–176. <https://doi.org/10.1111/sjop.12277>
- Ng, K., Niven, K., & Notelaers, G. (2022). Does bystander behavior make a difference? How passive and active bystanders in the group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bullying exposur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7*(1), 119–135. <https://doi.org/10.1037/ocp0000296>
- Nickerson, A. B., Aloe, A. M., Livingston, J. A., & Feeley, T. H. (2014). Measurement of the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for bully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7*(4), 391–400.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4.03.003>
- Nickerson, A. B., Feeley, T. H., & Tsay-Vogel, M. (2017). Applying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bullying.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2*(1), 37–48. <https://doi.org/10.1007/s40894-016-0030-3>
- Olweus, D. (1999). Sweden. In P. K. Smith, Y. Morita, J. Junger-Tas, D. Olweus, R. F. Catalano, & P. Slee (Eds.),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pp. 7–27).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
- Olweus, D. (2012). Cyberbullying: An overrated phenomeno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9*(5), 520–538.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12.682358>
- Paciello, M., Tramontano, C., Nocentini, A., Fida, R., & Menesini, E. (2020).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and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on cyberbullying: Do externalising problems make any differe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3*, 190–19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9.09.024>
- Padgett, S., & Notar, C. E. (2013). Bystanders are the key to stopping bullying.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2), 33–41. <https://doi.org/10.13189/ujer.2013.010201>

- Perren, S.,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E. (2012).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in adolescence: Differential role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value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9*(2), 195–209.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9.2011.643168>
- Pozzoli, T., & Gini, G. (2013). Why do bystanders of bullying help or not?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3*(3), 315–340.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12440172>
- Rabow, J., Newcomb, M. D., Monto, M. A., & Hernandez, A. C. R. (1990). Altruism in drunk driving situations: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in interven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3*(3), 199–213. <https://doi.org/10.2307/2786959>
- Rasch, G. (1960).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I. Probabilistic models for some intelligence and attainment tests*. Nielsen & Lydiche.
- Raskauskas, J., & Huynh, A. (2015). The process of coping with cyberbully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3*, 118–125.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5.05.019>
- Raykov, T. (1997). Estimation of composite reliability for congeneric measure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1*(2), 173–184. <https://doi.org/10.1177/01466216970212006>
- Robson, C., & Witenberg, R. T. (2013).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ly based self-esteem, age, and gender o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2*(2), 211–231.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2.762921>
-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https://doi.org/10.1016/j.avb.2009.08.007>
- Salmivalli, C., Voeten, M., & Poskiparta, E. (2011). Bystanders matter: Associations between reinforcing, defending, and the frequenc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classroom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0*(5), 668–676.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1.597090>
- Shaikh, F. B., Rehman, M., & Amin, A. (2020). Cyberbully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mpell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yberbullying. *IEEE Access, 8*, 148031–148051.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20.3015669>
- Slonje, R., Smith, P. K., & Frisén, A. (2013). The nature of cyberbullying, and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1), 26–3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2.05.024>
- Smith, G. S., Minor, M. A., & Brashen, H. M. (2014). Cyberbully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4*(1), 50–60. <https://doi.org/10.5590/JERAP.2014.04.1.05>
-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 376–385.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7.01846.x>
- Solomon, L. Z., Solomon, H., & Stone, R. (1978).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bystanders and ambiguity of emergenc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 318–32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7800400231>
- Steer, O. L., Betts, L. R., Baguley, T., & Binder, J. F. (2020). “I feel like everyone does it”-adolescents’

- perceptions and awarenes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mour, banter, and cyberbully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8, Article 10629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297>
- Sung, Y.-H., & Chen, L.-M. (2017).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preservice teachers' bullying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30(2), 35–66.
- Sung, Y.-H., Chen, L.-M., Yen, C.-F., & Valcke, M. (2018). Double troubl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school bully-victim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1, 279–288.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6.025>
- Wang, J., Iannotti, R. J., & Nansel, T. R. (2009).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5(4), 368–375.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09.03.021>
- Wang, M.-J., Yogeewaran, K., Andrews, N. P., Hawi, D. R., & Sibley, C. G. (2019). How common is cyberbullying among adults? Exploring gender, ethnic,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2(11), 736–741.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9.0146>
- Willard, N. E. (2007). *Cyberbullying and cyberthreat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online social aggression, threats, and distress*. Research Press.
- Wright, B. D., Linacre, J. M., Gustafson, J.-E., & Martin-Löf, P. (1994). Reasonable mean-square fit values. *Rasch Measurement Transactions*, 8(3), 370.
- Zhu, C., Huang, S., Evans, R., & Zhang, W. (2021).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global situation,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Article 634909.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1.634909>

收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31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2 月 07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2 月 15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5 月 09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6 月 09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9 月 14 日

六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9 月 21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09 月 22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4, 55(3), 491–51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Bystander Behavior in Different Cyberbullying Situations: Role of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Victim Behavior

Kuan-Ming Chen¹

Bystander behavior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either halting or perpetuating cyberbullying (Padgett & Notar, 2013). When bystanders choose to share, like, or repost aggressive content, they may inadvertently reinforce cyberbullying behavior. By contrast, actively defending the victim may reduce or even stop cyberbullying (Bastiaensens et al., 2014; Salmivalli et al., 2011). Consequently, the bystander effect is a key area of study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According to the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 proposed by Latané and Darley (1970), bystanders engage in five steps during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fter they witness an emergency such as cyberbullying: noticing the event, interpreting the event as an emergency,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vention, deciding on an appropriate course of action, and executing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verall, the BIM delineat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bystander effect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why individuals choose to assist or not assist the victim. According to Asanan et al. (2017), bystanders become more inclined to intervene when they become aware of cyberbullying. This model addresses only internal individual processes and potentially neglects the unique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the number of witnesses may be large, causing bystanders to engage in a cognitive mechanism referred to by Bandura (1990, 1999, 2002, 2016) as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 disengagement is a set of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enable individuals to circumvent negative self-evaluation and self-sanction, thereby morally disconnecting themselves from moral standards. According to Koehler and Weber (2018), the frequenc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creases when the actions of the victim violate social norm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victim'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In this study, we designed two cyberbullying scenarios and used the BIM to 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victim behavior, and bystander reaction intention. Scenario 1 involved a man who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and scenario 2 involved a man who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violating behavior. We hypothesized that (1)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posi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nd i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1, (2)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nd i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1, (3)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posi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nd i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2, and (4)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nd i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cenario 2.

For participant recruitment, we posted on Facebook, PPT, and Dcard (the thre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Taiwan) to attract university students. A total of 1,393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¹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Kuan-Ming 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a1942333@yahoo.com.tw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because they a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 internet users and are highly exposed to the risk of cyberbullying. After reviewing the study details,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cyberbullying identification test (Chao, 2021) and the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Paciello et al., 2020). Subsequently, they were presented with two hypothetical cyberbullying scenarios and asked to report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 scenarios (these items were adapted from Bastiaensens et al., 2014). For the analysis, we conducte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with PROCESS for SPSS (Hayes, 2022) to test our four hypotheses.

Our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rst,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r = .00, p = .99 > .05$),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first hypothesis. Second,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3, F = 40.30, \beta = -.17, p < .001$) and wa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without any apparent reason (coefficient = $-.02, p = .23 > .05$),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second hypothesis. Third,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defend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0, F = 4.75, \beta = -.06, p = .03 < .05$) and was not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violating behavior (coefficient = $.02, p = .29 > .05$),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third hypothesis. Fourth,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adjusted $R^2 = .02, F = 29.57, \beta = -.14, p < .001$) and was moderated by moral disengagement when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because of his norm-violating behavior (coefficient = $-.04, p = .03 < .05$),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ourth hypothesi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victim was cyberbullie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or for violating social norms, the bystanders exhibited only a moderate tendency to defend the victim, and this tendency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n other word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bystanders perceived the ongoing event as a cyberbullying incident, their inclination to assist remained the same.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Asanan et al., 2017; Elçi & Seçkin, 2019; Steer et al., 2020), identifying cyberbullying can prevent bystanders from becoming bullies or victims. However, no direct evidence currently exists regarding whether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ncreases the willingness of bystanders to assist. Therefor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is regard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initiating defending behavior, with 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 influenced by other factors.

In the two scenarios,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standers' reinforcing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bystanders realized that the current event involved cyberbullying, they becam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reinforcing behavior, such as liking, sharing, reposting, or commenting on post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Asanan et al. (2017), who indicated that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reinforcing behavior. In this study,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ictim behavior and bystander moral belief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bystander behavior. Our moder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the victim violated social norms, moral disengagemen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reinforcing behavior, whereas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 the regular cyberbullying scenario. These findings support our second and fourth hypotheses, indicating that if bystanders lack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nd hold belief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such as moral justification, dehumanization, or victim blaming, they may become more inclined to rationalize their reinforcing behavior as an act of justice. Their moral sense may also have a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ir actions, resulting in increased reinforcing behavior. By contrast, if bystanders become actively aware of their own behavior, even if they hold moral disengagement beliefs, they may become less likely to rationalize their reinforcing behavior, which enables them to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ir own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our research findings, we offer three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ng or intervening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First, becaus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bystanders, we recommend that schools implement antibullying programs that emphasize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among all members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includi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Second,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reactions of bystanders are influenced by the victim's behavior. Bystanders are more likely to refrain from assisting or even engaging in reinforcing behavior if the victim has previously violated social norms. Notably, cyberbullying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bullying because online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one-sided, which can challenge bystanders' ability to fully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the victim, leading to premature judgments regarding the victim's behavior (Liu et al., 2019). Therefore, when bystanders witness a cyberbullying incident, they should attempt to first understand the full context of the event, gather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refrain from premature judgments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Lastly, in programs aimed at combating cyberbullying, we recommend that teachers incorporate dilemma-based instruction and address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beliefs of their students. For stud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eachers should explicitly communicate that cyberbullying is an unacceptable means of seeking justice.

This study has some limitations. First, our sample comprised only college students, thus limit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our findings to other populations. Second, all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self-reporting instruments, 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mono-method bias. Third, only one norm-violation scenario was examined.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clude a wider range of scenario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influences bystanders'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Keywords: cyberbullying, cyberbullying awareness, moral disengagement, victim behavior, bystander behavior

